

【科技与人文】

赛博空间无产阶级数字劳动的出场及命运展望

罗小青,董荣波

(云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赛博空间是一个人造的空间,是数字化、网络化和人工智能化时代的产物。数字劳动是在赛博空间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正如马克思描绘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劳动异化那样,赛博空间数字劳动也存在严重的异化。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既涵盖赛博无产阶级与自己的数字成果、劳动行为、类本质的异化,也包含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异化不应该是人类永恒的命运,人类需要彻底扬弃资本主义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因此,我们需要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建构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树立“数字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目标。

关键词:赛博空间;数字劳动;无产阶级;数字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章编号:**1673-5420(2023)03-0021-11

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是加拿大作家威廉·福特·吉布森于1982年首创,也可称作网络电子空间(Cybernetics)或者网络空间(Network Space)。在赛博空间当中,现实与虚拟、真相与仿像、此刻与彼时、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界限好像消失了,人们陷在自己用物质和精神构筑的空间中不能自己。赛博空间是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的产物,丹·席勒认为,“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1]15}。赛博无产阶级是由数字劳动与无产阶级连接起来的概念,指在封闭人造的赛博空间中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尼克·迪尔-维斯福特最先阐述了数字劳动与无产阶级相连的关系,他说:“强制移动连接就是控制论的无产阶级化所必须的日常行为。”^{[2]136}

在数字化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大机器生产背景下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关于固定时空中的劳动和资本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学说,而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化时代,非物质性劳动占据重要份额,超越固定时空、依赖于媒介技术和网络空间的数字化劳动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基于物理空间向数字化空间的转换

收稿日期:2023-02-20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罗小青,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项目“高中与大学思想政治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一体化研究”(AFS222008)

和物质性劳动要素向非物质性劳动要素转换的现实与理论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否还有效,数字劳动和数字劳动异化的理论是否成立,这是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直面数字资本主义的现实,阐释赛博空间中无产阶级劳动现状和异化命运,展望无产阶级未来的生存命运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一、数字劳动与赛博无产阶级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3]277},并揭示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重大意义,即“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4]367}。在大数据时代,物质性世界退隐到数字化世界中,人类经验的数字化、超验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凸显了劳动形式的转轨和阶级形式上的变迁。之所以说是“形式上”的变迁,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思考,这在实质上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传统的固定时空劳动转变为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从依赖物质性生产要素的劳动转变为依赖非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数字劳动。福克斯认为:“数字工作和数字劳动是广义范畴,涉及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中的所有活动。”^{[5]458}

(一)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89}随着历史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工业文明逐渐向数字文明跃迁,作为新的劳动空间的赛博空间产生了。数字劳动是赛博空间中的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它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范畴,仍是引起人类社会变迁的核心力量。在数字化时代,马克思认为的劳动四大构成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过程转变为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对象、数字劳动资料和数字劳动过程。数字劳动者是平台用户和平台技术工人,数字劳动对象是用户的数据行为和平台技术工人处理的数据,数字劳动资料是网络平台和数字技术,数字劳动过程是用户产生数据行为以及平台技术工人运用数字技术对数字产品的归类、分析与处理的过程。虽然数字劳动具有非物质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完全脱离物质劳动范畴,因为只要劳动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6]47},就具有物化特征。数字劳动也有其对象,劳动者在赛博空间中所留下的数据离不开人的存在,依然具有对象化特征。因此,数字劳动依然是人们追求自由自觉类本质的再现和人的本性的复归。

数字劳动的内涵是以数字嵌入而呈现的劳动,当人们享受到数字技术提供的移动支付、网络购物、在线娱乐的时候,也开拓出一个新的劳动场所,这就是一个包含浏览、点赞、娱乐、收藏、购物、交流等一系列用户活动,以及平台技术工人收集、分析用户活动留下的数据行为的劳动场所。

数字劳动的典型特征是工作的娱乐化和娱乐的工作化,模糊了劳动与娱乐的边界。当平台用户进行网络活动时,其劳动就已经开始了。用户的数字劳动被平台技术工人收集、分

析和加工后变成数字商品进行销售,为数字资本家赚取利润。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除了在传统时空中进行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还要在休闲娱乐中继续为数字资本家创造数字利润。为此,福克斯指出:“娱乐时间和工作时间是交互的,人类存在的所有时间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5]169}“玩”和“劳动”被混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是互联网平台的中介作用,当“劳动”以“玩”的形式出现时,一个既分不清劳动也分不清娱乐的世界便诞生了。一句话,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辩证法”,居然把“玩”也变成了“生产劳动”。

数字劳动还模糊了生活与商品的关系。平台收集用户的身份信息、网上信息,并跟踪用户网络活动的轨迹,提取、分析、计算用户的各种数据,让它们变成数字商品,并且在互联网上进行买卖等活动。平台还可以把用户线下活动的轨迹也纳入监控范围,表面上的私人活动空间实际可能成了平台监视的数据材料,最后变成数字商品和数字资本。

(二)数字商品、数字货币及数字资本

数字商品是平台技术工人运用算法工具对用户行为进行数字加工的结果。平台用户是数字行为的主力军,他们在平台上所进行的海量数字行为就是数字商品的原材料。“数字化能够使他们在传播领域扩张商品的形式。”^{[7]146}当然,数字行为要成为数字商品还需要平台技术工人运用智能化技术和算法工具对其进行分析、计算,并把归纳出来的有规律的数据卖给广告商,广告商再根据这些数据向平台用户推送各种广告,此刻的数字行为才变成数字商品。因此,数字商品离不开平台用户的数字行为,也离不开平台技术工人的加工行为。

数字货币是数字商品交换的产物。在数字化时代,商品的数字化加上货币的数字化共同促成了数字货币的产生。一方面,平台技术工人不断把平台用户的信息加工成体现用户活动规律的数字信息,变成数字商品,然后将其出售给广告商,从而为平台资本家带来利润。另一方面,平台技术工人运用算法工具精确加工平台用户的行为数据,使数据变成数据商品。数据商品在全球范围内出售,进而催生全球数字货币。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资本家得到大量的利润,平台技术工人得到工资,只有平台用户在免费提供数字劳动。正由于平台资本家把“信息当作一种资本从表面和深度上加以开发”^{[8]29},并把用户行为当作免费的开发原料,又通过雇佣技术工人进行加工,才使数据变成了数字商品,数字商品又变成了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成为剥削数字劳动的数字资本。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资本家那里,利润代替了资本的称谓。当然,货币要成为资本,首先需要劳动力成为商品。在数字化时代,有一个特殊点,即用户的数字行为并没有得到资本家的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没有剥削行为。数字货币在全球互联网和数字平台流动,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数字利润,从而成为数字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用户在平台上留下的图片、声像、符号等数字信息实际上就是数据,数据就是赛博空间的代码,当技术工人把用户留下的代码进行加工、赋值,然后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换时,代码就成为数字商品和数字货币,继而就像源源不断的石油一般成为全球数字资本家的数字资本。

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不再满足于传统雇佣劳动体制下对劳动者体力劳力的剥削和压迫,而是运用智能化的大数据算法权力对数字劳动者进行掠夺和吸纳,让数字劳动者在“舒舒服服”的消遣中劳动,在“快乐”中满足数字资本不断增殖的野心。

(三)何以存在赛博无产阶级

在赛博空间时代和数字劳动逐渐成为重要劳动形式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和剥削依然存在,那么问题就转向为是否还存在“无产阶级”呢?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学界不能回避,也不能毫无理由地肯定和否定。对此,需要有严格的学理和逻辑路径,并要求有现实的实践依据。

有些学者认为,既然传统机器大工业时代已经向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延伸,用户的数字劳动是不记酬的劳动,是没有雇佣协议的劳动,因此就不能算作剥削。何况,数字化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教育、医疗、住房也有较好的保障,他们怎么还能被称为无产阶级?

在 1888 年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上,恩格斯专门加注了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9]31}。这就为无产阶级的概念奠定了一个规范的标准,即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也许有些人会认为,恩格斯确定的标准是适应 19 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定义已经不适合了。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就会发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赛博空间劳动者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产业工人的身份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数字平台是属于平台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用户虽然可能没有付费,但实际上已经在劳动,并为平台资本家生产数字利润。平台技术工人是平台资本家雇佣的数字劳动者,他们虽然获得了工资,但是其工资远远少于他们所创造的数字利润,即他们获得了数字劳动力价值而没有获得自己的数字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无产阶级内涵,无产阶级的“产”不是财产的“产”,而是生产资料的“产”。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才是衡量一个群体是否是无产阶级的主要依据。因此,虽然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随处可见,但是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无产阶级的命运并没有实质改变,在数字资本运作的逻辑面前,数字资本家高高在上,赛博无产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在第三世界,没有基本生活条件、基本工作保障、基本安全的人们也拥有手机,但是手机只是他们在休闲时继续接受资本家剥削的工具。“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些第三世界的最贫困的人群成为数字资本的牺牲品,而且那些生活相对丰足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数据和监控的控制。”^[10]

那么,谁是今天的赛博无产阶级呢?我们可以从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在互联网和数字化时代,赛博空间中的无产阶级主要是数字劳动者,而数字劳动者中最庞大的群体就是平台用户,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是数字劳动的原材料,

他们的劳动就是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者还包括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和传送的平台技术工人,以及开采、组装数字设备和研发数字软件的相关领域技术人员,而且实际上这些技术工人同时也是平台用户。平台用户是无酬金的数字劳动者,平台技术工人是计酬的数字劳动者,他们都受到平台资本家的剥削,一起构成了赛博空间的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很少有人不是平台用户,也很少有人完全没有受到数字资本的剥削,普及化的手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数字资本剥削的工具。数字劳动者“在此汇聚,并构成了大众的机制”^{[11]405},赛博无产阶级就是在社会中被数字资本控制和剥削的大众。

二、赛博无产阶级数字劳动的异化

在数字劳动时代,赛博无产阶级到底还存不存在劳动异化问题,这不单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理性高扬主体和理性,宣扬个性的独立,追求社会的进步,社会财富聚集越来越庞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多。面对分化程度越来越高、结构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人们有到一种无力感,这就是异化(alienation)。阿多诺把个体的异化归结为社会化,认为“彻底的社会化意味着彻底的异化”^{[12]62},阿伦特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还把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联系^{[13]54}。实际上,阿多诺与阿伦特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有偏差。马克思并没有一般地把异化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分化和社会化,而是抓住了人们的“无力感”来自一种不正义的社会制度,强调这种制度充满了剥削和压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前者是剥削阶级,后者是被剥削阶级,两个阶级都遭到异化。资产阶级的异化体现为资本家成为金钱的奴隶,无产阶级的异化体现为劳动异化和贫困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劳动的四重异化现象: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异化、劳动行为与工人相异化、工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类进入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同样面临劳动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以往机器工业时代的劳动异化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数字劳动异化。

(一) 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

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以往的剥削形式,但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剥削发生实质的变化。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依赖于工厂的物化劳动,资本家对工人进行赤裸裸的掠夺和压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依靠的是数字平台,依赖于平台用户的劳动数据和平台技术工人对数据的加工。资本主义的剥削根源在于私有制关系,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私有制也仍然是异化的祸根,大规模的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由数字资本家控制,赛博无产阶级创造的数字经济利益也由数字资本家掌握。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工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冲突,而现实是赤裸裸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马克思说:“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正好成反比,正像高利贷者靠挥霍者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挥霍者的利益相一致一

样。”^{[6]37}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数字资本家不断加强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数字资本的积累越来越集中,形成数字资本垄断和数字资本寡头,它们不但控制了国民经济体系,而且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数字金融资本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操控。

表面看来,平台用户自愿的带有娱乐性的行为并不构成剥削问题,因为资本家并没有为他们的数字劳动付酬。但不能以是否支付工资当作是否存在剥削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言,“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14]927}。平台用户的数字劳动尽管不是强制的结果,但某种意义上还是受到资本的操控,受制于数字资本对利润的需要。无论如何,数字资本依然是“死劳动”,而“活劳动”是赛博无产阶级的劳动,“活劳动”与“死劳动”的结合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死劳动”只是条件,“活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因为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5]269}。数字劳动者只是互联网中的平民,赛博空间只是数字劳动者的贫民窟,表面看来自由自在的网络行为,实质只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为数字资本获取利润的一个个相互隔离的“数据”而已。数字劳动者只是数字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工具,只不过是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资本家追求利润所需要的一串串数字,就是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笔下形容的统计数字,只不过在数字化时代这个统计数字是由网络平台运用精确算法得来的。

(二)数字劳动异化的表征

数字劳动异化与传统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形式上还是有所区别,主要表现为贫困化、主体丧失、类本质及人与人的异化。

贫困化的数字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即对象化的活动。劳动者确定劳动对象,采取手段,运用条件,付诸行动,最后得到结果,对象化的结果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也确证了劳动者作为自由人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结果是工人劳动越多、创造越多,他自己获得的越少,也越来越贫困。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也创造了一个贫困的阶级。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根源并非是数字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只是资本的具体形式,是剥削劳动者的手段,而剥削的根源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即数字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关系。数字资本家操控着数字资本,他们是数字生产资料的掌控人,而数字工人或者是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占有自己的数字劳动,为数字商品提供原材料,或者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谋生,把自己的数字加工劳动售卖给数字资本家,成为被剥削的赛博无产阶级。一方面是数字资本家财富的积聚,另一方面是数字工人贫穷的积累,“数字工人的贫困就成为资本家财富的来源”^{[5]346}。

使主体丧失的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还表现在主体与生产行为中。看似轻松的数字劳动,其实是脑力与体力的大量消耗,人们在赛博空间中的谋生并不比在物理时空中的劳动轻松。人们深陷在赛博空间中不能自己,从浏览网页、娱乐、购物、社交的用户,到

依赖网络分析、过滤、运算的数据工程师,他们都模糊了生活与工作的界限,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主体性。马克思把这种劳动描绘为“去势的生殖”“受动的活动”;海德格尔把统治称之为“座驾”(gestell),所谓“座驾”即现代人受到技术的统治。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与资本合谋具有支配人的作用,“人则通过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人因此把自身确立在世界之中。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以科学对具体存在者领域的开拓为基础和尺度的”^{[16]1244}。在资本和数字技术联姻的力量面前,人们无能为力,显得异常渺小。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看,海德格尔过于悲观,因为他完全否定了人们改造世界的作用,寄希望于“神”。但不能否认,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还多少反映了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所导致的主体命运问题的难题。赵汀阳先生感慨道:“很难想象有什么能够阻挡技术和资本这两种力量的合流,在资本和技术面前,人文的理想恐怕是弱不禁风的。想到这一点,确实令人感到悲哀。”^[17]因此,一方面,人们好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性,生活也越来越舒适,但另一方面,人们却越来越迷失在自己创造的数字技术中,数字技术与资本共谋,它们奴役人、控制人,使人们越来越丧失主体性。

类本质及人与人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即人的有意识的自由活动,根本上是自由与自觉的活动。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劳动者变成了不自由的受到压抑的人,成为被数字计算、分析和利用的“赛博人”。他们无时无刻不与数字信息发生关联,表面看来有特点的人们,实质是“同质”化的群体,既像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的人”,又像海德格尔笔下的“常人”。数字技术使商品的范围扩大,互联网上的一切行为都可能纳入到商品的范围,资本控制了一切数字材料,人们表面的个性生活实质是数字资本规训下的无声无息的“赛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数字资本只考虑利益,数字劳动者也没有选择,赛博无产阶级受到剥削,数字资本家也处于异化之中,因为资本控制工人的同时,也同样控制了资本家,就像马克思说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18]120}。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隔阂、缺乏信任,只有金钱裹挟下的虚伪的温情关系。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真实联系,成为莱布尼茨描绘的“单子”,人类就像居住在“孤岛”中,看似在数字平台上快乐地享受着数字资本带来的便利,但其实都在不自觉地受数字资本的盘剥。当数字资本不断集中,就会导致垄断的出现,数字垄断资本主义就会进一步发展到数字帝国主义,从而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导致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

三、赛博空间无产阶级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与命运展望

以上探讨厘清了数字劳动和赛博无产阶级的出场逻辑,展示了数字技术-数字劳动-数字商品-数字资本的学理基础,也探索了数字资本的剥削-数字劳动的异化-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的逻辑框架。那么,面对赛博空间数字劳动异化的现实,应该如何拯救数字劳动者的主

体性,凸显其主动性和能动性,用自身力量改变异化的世界,使数字技术和资本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呢?

(一) 学理上展开对数字资本逻辑的批判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马克思确立了一个逻辑起点——商品。从商品开始,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并回溯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进而研究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展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论证了劳动主体是工人阶级,工人的劳动才是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根源。马克思阐释了货币的本质,提出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才转变为资本,并指出了劳动力商品的特征。马克思阐述了商品的内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秘密,也阐述了货币产生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外在矛盾即商品与货币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商品社会,是商品买卖的社会,商品交换本质上就是劳动交换。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要获得利润必须获得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的关系就转换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商品拜物教”就转换为“货币拜物教”,进而转变为“资本拜物教”,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的“命脉”,也是资本主义的“润滑剂”。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运行逻辑的本质与马克思所处时代是一致的。但数字资本的运行形式也有自己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数字资本控制下的数字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数字资本家掌控数字生产资料,雇佣或者免费利用数字劳动者创造数字财富,并把数字财富加工后售卖给广告资本家,再通过广告资本家定点推送广告而赚取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资本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它体现了资本权力的统治地位,占据并剥夺了数字劳动者的权利。由于数字资本主义全方位强化了对资本的掌控力度,使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异化现象,也使数字劳动同样发生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实质是数字资本家通过掌控资本和数字技术而对赛博无产阶级展开的剥削和压迫。当然这种剥削和压迫是无声无息的,是把劳动与生活界限模糊化的新的剥削形式,它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隐秘性,有学者把这种剥削形式概括为“玩工”^[19],“玩工”消弭了工作与休闲、劳动与娱乐、消费与生产的界限。

(二) 实践上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提出各国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对全球网络治理的愿望。2020 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上提出:“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20]无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共同体还是数字共同体,都秉持了同样的价值前提——类文明,类文明即共识文明。类文明蕴含了全球“包容、开放、互惠、共享”的共识和价值理念。全球共同体理念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担当大国责任,倡导先进文明形态的体现。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字经济逐渐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明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缺少相关的产业技术和资金投入。发达国家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经济突飞猛进,在很多数字领域出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势。数字帝国主义也逐步抬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逐渐建立起数字霸权,在全球掠夺数字劳动,赚取全球数字利润。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2017年,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41%,并且仍有31个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不及20%”^[21],从这份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差距。因此,构建全球数字命运共同体势在必行。

这就需要我们深化网络人文交流,减少各方摩擦,推进交流互动,鼓励多元文化共存,增进互信,构建求同存异的全球文化大熔炉;完善全球数字规则,打造安全数字生态环境,包括寻求国际战略合作,打击网络犯罪,建构互信互助互联的网络治理平台;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国家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建设,增强数字领域的竞争力,加快公共数字平台建设,构建平等、安全、共享的数字平台。

(三)目标上推进“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设

赛博空间无产阶级存在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数字资本主义的支撑点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推动力是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无产阶级是被前两者纳入的被动生产要素。当一种制度把人当作生产要素,当作获取利润的工具时,这种制度就不是理想的制度。美国学者福山把美国式自由社会当作人类“历史的终结”,看来是过于自信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天下太平、和和睦睦,世界非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仍然存在战争、饥饿和贫困,恐怖暴力事件也不断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历史性阶段,不是永恒的。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消灭私有制不是消灭某一种私有制,而是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导致的对立关系和异化关系,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9]260},因为私有制是造成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关系的根源。

实际上,资本运行的逻辑本身蕴含了“自否定”。辩证法的灵魂是“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以一种外在力量推进的,而是事物本身力量使然。事物自身发展产生了对立面,对立面与事物构成矛盾,矛盾的根本属性是对立统一,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事物就是在这种辩证运动中前进,依赖于事物不断否定自身而前行。“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22]225}只有对以数字平台为表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彻底扬弃,赛博无产阶级的权利才能得以保障,数字劳动才得以成为“自由”的类存在,数字平台才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性要素。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借助数字资本的逻辑,推动其向真正的人类共同

体前进。也就是说,赛博空间无产阶级需要有历史担当的信心和动力,未来,他们失去的将只是私有制下的数字锁链,赢得的则将是全世界。

参考文献:

- [1]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M].燕连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5]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M].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7] 文森特·莫斯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8] 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结构[M].邢立军,方军祥,凌金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蓝江.从物化批判到数字资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历程[J].学术界,2021(4):26-34.
- [11] HARDT M, NEGRI A. Empire[M].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2]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13] 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7] 赵汀阳.人工智能会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吗?[J].开放时代,2018(6):49-54+6.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尤里安·库克里奇.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J].姚建华,倪安妮,译.开放时代,2018(6):196-206.
- [20] 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0-11-24(01).
- [21] 马述忠,房超.弥合数字鸿沟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N].光明日报,2020-8-4(12).
- [22] 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张秀宁)

The appearance and destiny outlook of Cyberspace proletarian digital labor

LUO Xiaoqing, DONG Rongpo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Cyberspace is an artificial space that is a product of the digital, networked,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Digital labor is a new form of labor formed in Cyberspace, just as Marx described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in the era of machine industry, digital labor in Cyberspace also has serious alienatio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era includes the alienation of the Cyber proletariat and its own digital achievements, labor behavior, and human categorical nature,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alien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lienation should not be the eternal fate of human, and human needs to completely abandon the labor alienation of the digital era of capitalis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launch a theoretical critique of digital capitalism, construct a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in practice, and establish the goal of “a consortium of digital free individuals”.

Key words: Cyberspace; digital labor; the proletariat; digit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上接第 11 页)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YUE Aiwu, ZHU Juncheng

(School of Ma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on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 gathering place and condens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space of the masses, and a arena and struggle ground for various classes, group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al forces to compete. Currently, China’s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face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in innovating propaganda methods,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promo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is, Secretary-General Xi Jinping emphasized the need to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arty’s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grasp the laws of media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uild a professional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team,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news media,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s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nsolidate the position of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position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wer